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往事非烟】	留在北京	曹一凡
【史海钩沉】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陈徒手
【理论研究】	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二）	吴思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往事非烟】

留在北京

• 曹一凡 •

一

一九七一年八月，我被分到北京西城碳素厂当工人，差不多是最后一拨儿离开四中的老三届学生。多年后，我岳母惊奇地问我，你怎么就没上山下乡，留下来了？她老人家是老清华，周围那些大学附中留下来的本来就少，更甭提像我这样“泡病号”留下的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一些人带头儿去内蒙古牧区插队，四中有李南飞、刘力前等七人响应。此后上山下乡的浪潮接踵而至。最初红代会去内蒙古插队时还在天安门广场宣誓，让毛泽东主义的光芒照亮内蒙古草原、照亮全中国、照亮全世界……到了一九七〇年，内蒙古军垦兵团招工的口号已沦为：住砖房、吃白面、发工资了。

四中学生上山下乡的高潮，始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黑龙江农场（当时还未改称“生产建设兵团”）的招募。老初三的牛硕儒（牛耕），高三（四）的老驴头（吕斌轩）属于这意气风发的第一批。可死水微澜，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那时节，躲在家中看书、装半导体的谓之“逍遥派”，赵振开还在顽强追求革命理想，他和我们班几个同学以“红卫兵六五一四部队”的名义半夜三更在西单路口贴标语“炮轰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钟奇”，并穿越武斗的枪林弹雨，到白洋淀搞教育革命调查。振开和我自小学二年级起就没分开过，但本人出身旧官吏，碰到这等危险事，我退避三舍。

一九六八年一月，兰州军区军马场招工；北京外文印刷厂招工；北海舰队招兵。二月中旬，青海乐都铸造厂招工，那可是杜甫“兵车行”的地界，初三的王祖荣和高三的周琨报名，他们是我三不老胡同一号的邻居。京郊招中小学教师。七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招募；陕西汽车制造厂等企业招工。九月，京西矿务局招煤矿工人；去内蒙古默特左旗插队。十二月，北海舰队第二次招兵；动员六七届毕业生去山西雁北地区山阴县插队。同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宣队要求每人表态，校园到处张贴着同学们响应的大字报。在校长室西边大字报主墙上，高一（六）班班主任刘永章贴出“忽如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正值此时，张育海在教研组小院对我说：“我被漏划了。”带着一丝仓皇的苦笑。公布的下乡名单没有他，等着他的却是传闻中隔离审查的命运。

一九六九年一月，北京电机厂招工。二月，到陕北延安地区延长县插队的六八届毕业生动身。三月，北京第六建筑公司招工；去吉林白城大安县插队。四月，内蒙古军垦兵团动身。五月，云南瑞丽军垦兵团动身。八月，黑龙江兵团的六九届毕业生动身。

风卷残云，校园里没剩什么人了。大规模动员转成由学校街道与父母单位相结合的方式，督促剩下的学生上山下乡。

## 二

一九六八年末，大潮滚滚而来，北京实在待不下去了，史康成、徐金波和我决定结伴而行。我们仨去拜访师大女附中李燕翎，她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传闻是张育海的女友。她暂住在东四十二条的叔叔家。李燕翎个儿不高，大眼睛，身材结实，脚蹬皮靴，头戴羊剪绒皮帽。没聊几句就说到张育海，一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一〇一中的贾平在赴阿荣旗行前作诗，第一句“壮辞名园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草原本就诱人，听说工分值高，能养活自己，我们决定一起去阿荣旗。

西单商场设有“知青”专卖店，除了被面、大衣、皮帽、棉帽，还有木箱和手提包，上面印着林彪手书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挤得水泄不通，我们跟着排长队。

我母亲单位的局长听说我要下乡，叫我去她家一趟。她和我母亲正在京郊南口农场改造，关在同一个牛棚，两个月可回家一次。局长的丈夫李琪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因著有《矛盾论浅说》而闻名。文革前顶撞江青，文革初为保护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而自杀。我走进万明路的偏僻院落中的一间低矮厢房，屋子很冷，局长盖被坐在床上，头戴北方妇女那种方格头巾，她话不多，除了勉励，还叮嘱我下乡要注意身体。她送我一床被面和三十块钱。那紫红色的被面光泽像缎子，但结实耐洗。想到她还要抚养四个孩子，心情甚是沉重。

正当我们整装待发之际，工宣队把史康成抓起来，关在音乐教室小院。史康成要我们先走，他以后再加入。可他身陷囹圄，情况不明，怎能在此时此刻弃友而去？担任看守的都是就近入学的新生，对我们很客气，只要“军训团”和工宣队的人不在，我们可随时探视聊天。

灾难使友情升华，我们赋诗应和。我写下“肝胆誓分兄弟难，头颅掷处血斑斑”，徐金波在绝句中信誓旦旦：“天涯海角陪小东”（小东是史康成的乳名）。史康成的妹妹史保嘉去内蒙古扎鲁特插队。我去找她的朋友，一个叫刘钢，一个叫鲍婉婉。刘钢拿出保嘉的诗词给我们看，冰雪聪明，令人神往。

史康成隔壁关的是赵京兴，就在前不久，在同学们纷纷表态下乡的大字报中，赵京兴贴了张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光这题目就够吓人的。他还有理有据，引用毛主席

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到的下乡的三种形式：走马观花、下马看花和下乡落户。而他的首要任务是要留在城里读书。

阿荣旗之行就这样被搅黄了，徐金波和同班的朱之鑫、张友筑、罗超、赵岳伦、曹侠洲和周之穗去了吉林白城地区插队。

### 三

史康成被放了出来，我们俩又改了主意，不想去插队了。眼看当兵的当兵，进厂的进厂，凭什么我们非得插队？史康成留下一句颇有哲理意味的话：“每个人都有上山下乡吃苦的义务，也都有留城进工厂的权利”，一时间成了我们自我激励的箴言。

可要想留下来也要有点本事，工宣队毫不留情。他们的口号是“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工宣队的师傅苗小发管分配，颐指气使。高三（四）班的徐文连是海军大将徐海东之子，几次下乡都没走，苗小发专要拿这号人物开刀，顺便到大将家里喽一眼。他自知四中工宣队级别不高，特地先去开出指挥部的介绍信。徐海东家住东城，大门上有小门，小门上有小窗。苗小发按响门铃，小窗打开，解放军战士露头询问，苗小发要见徐海东，被回绝，他递上介绍信，大讲“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当兵的不为所动，最后留下句话：“实在要见，到总参换介绍信去！”把小窗哐地关上。苗小发回校破口大骂：妈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是总参领导一切！他把气撒在学生身上。高一（二）班姓白的同学被分到云南农垦兵团，但他患有严重的过敏症，申请能否去个不毛之地，代替那鲜花盛开的云南。苗小发破口大骂：“什么？青草过敏！我还窝头过敏呢！少废话！”那同学只好勉强去了云南瑞丽。

一九六六年冬天我去井冈山和韶山步行串联，回来住在冰窖似的四中十三斋，曾得过风湿热，恰好用来作借口。一个积水潭医院大夫给我开了三天风湿病假条，逃过一劫。这大夫后来成了我姐夫。史康成曾患肺门淋巴结核，吃中药短时间内转氨酶增高。他把化验单往学校一交，工宣队拿他没办法。

“各村都有很多高招”，比如蹬腿攥拳头血压准上去。我们班杨晓云赶上体检，照此办理怎么也不灵验，溜出来在新街口力生药店买了麻黄素，这药管用，忽悠一下升得太高了，医生直安慰他别紧张，坐了一个钟头看没危险才让他走。有人装肾炎，躲在厕所往尿里掺蛋清，这招我不看好，人体蛋白和鸡蛋白到底不一样。

天不灭曹，我偶然获得重大发现：尿糖检验，各种医书化验书都讲比色法，用试纸、试剂，不同颜色对应着一到四个加号，到底这加号多少与糖的数量关系，没有哪个化验室的医生知道。全世界这核心机密被我探知！如果能对应着加号配制尿糖浓度颜色已无意义。而配制尿糖浓度用的滴管，连婴儿用品的柜台也能买到，每十四滴是一毫升。药店卖的葡萄糖注射液有两种浓度：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五十，你要再知道了加号对应的浓度，怎么干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装糖尿病的朋友们，欢迎带着试管和葡萄糖找我，本人乐于效劳：很简单，往试管的尿中滴葡萄糖，四个加号滴多少，一个加号滴多少。那年头儿医院设备少，一般只化验尿常规，够开假条就得了。如果大医院验血糖，甚至做糖耐量试验，本人均有对策。至于这浓度到底是多少，血糖化验怎样应对？在此不便泄露。

七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北海公园聚会，有个同学的妹妹嚷嚷：“糖尿病的照一张！”呼啦啦，因糖尿病留京或返城的竟有七八个，我都傻了。我被“糖尿病患者”幸福地簇拥在中间，一起合影。

#### 四

等分配的日子还是挺美好的，我们多用来学习。北京图书馆的琉璃瓦殿堂自然是最佳去处，不过进门要凭单位介绍信，我等无业游民均被拒之门外。好在赵振开总有办法搞到介绍信，单位五花八门，包括六建公司和他父亲所在的“民进中央”。介绍信有时限，这就要看涂改技术了，比如把有效期从十天改成九十天，甚至改了又改。调制涂改液的配方，前人之述备矣，无非草酸、漂白粉之类，反正不是氧化就是还原。幸亏流行用钢笔，介绍信纸又好，修改比较容易，但赶上粗糙淡黄的信纸、外加渗入纸纤维深处的圆珠笔油，不留痕迹还真不易。有一天去北图，介绍信又换了单位，管理员老太太从眼镜片后面抬起眼睛，满脸狐疑，让我怦然心动。好在她研究了好半天，也没看出破绽。

北图大阅览室快成同学聚会的场所了，多达十几号人，包括高一的潘鲁全（外号大狗）和高二的施以政。潘鲁全的姐姐专攻化学，开的是山西省山阴县化肥厂介绍信。施以政从我闻所未闻的嘌呤、嘧啶概念开讲，听得我云山雾罩。

赵振开、史康成和我友情甚笃，人称“三剑客”。每人一门外语：振开学英语，史康成学德语，我学日语。人家二位一度靠外语为生，我日语上手最快，终未成气候。我在北图开始翻译一本日文书《可怕的公害》，由岩波书店出版。最初尚有一一〇中高三的张树人参与。日本人根据切肤之痛，提出“公害”的概念。谈到污染严重处，甚至引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批判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我和张树人每天早上来到北图，借出此书，查词典翻资料，直到关门。有次递进书单，紧盯着来自书库的绳拉小车，等了大半个钟头，被告之借走了，吓出一身冷汗。等了三天，那小车终于把《可怕的公害》拉了出来。后来张树人回了山西，我独自译完。

外文资料只许在科技类中借阅。要是谁煞费苦心，淘到可读的擦边踩线的书报，就成了大家的财富。有本杂志《科学技術の広場》逃过审查，这是日本共产党《赤旗报》办的刊物，有文章披露中朝两国边界纠纷：文革中金日成倒向苏联，中朝交恶，高音喇叭互骂，甚至筑起堤坝拦水冲击对方河岸。其中有段文字涉及长白山主峰和天池的归属争议。

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的夫人在四川时是我母亲的同事，两家熟稔。我有时到钱先生家小坐，谈起这杂志和中朝边界。钱先生对政治有特殊的敏感，又是大杂家，对中朝边界问题门儿清。“知识分子就是讨厌，地图都有好几本。”他自言自语，取出两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一九五〇年版，天池和主峰明显都在中国境内；五十年代中期版，分界线把长白山一分为二。钱先生很生气：“改国界，是要全国人大批准的，连政府都没有权力！”他不敢再深说，怕我生事。对我翻译《可怕的公害》，他倒是很鼓励，介绍给来访的旅英女作家韩素音，后来又推荐到科学出版社争取出版。

#### 五

那时节我收集不少好书，甚至成套的经典，请楼下小京刻了个随形章“一凡藏书”，盖在书扉页上，得意地称之“用印”。很多书是在旧书店门口“守株待兔”，或是向收破烂儿的小贩争来的，这方面不乏好手，黄其煦、郎放均是也。

有一次，在西单商场旧书店，一个高贵美丽的阿姨提着篮子卖书。书店按斤收购，每斤一毛三，跟烂纸价差不离。她摇摇头，倒空篮子，把书都送给我。算我走运，那些精装的好书中有《侯外庐选集》和《别林斯基选集》。还没来得及“用印”，高二（二）刘捷一伙来

家串门，我正在里屋洗照片，出来时那几本书不翼而飞，不知哪位卷走了。当年这种书的流动方式很正常，到别人家看到如意的，顺手牵羊，没有偷与被偷的概念。

我还有过几本世界美术全集，日文版，是同班的“狒狒”（大名张永和）从图书馆“顺”来送给我的。狒狒比我们早一年进四中，某校金质奖章保送生，结果进四中头一年就留了级，成了我的同班。自一九六八年起，北京打群架成风，狒狒是财政部红楼宿舍的头头儿。他平素骑锰钢车，套头帽翘得很高，军挎包装着菜刀。他常有些来历不明的物件：一个帆布行李箱卖我五块钱，正好我妹妹去黑龙江兵团用上了，还有件军用雨衣也五块钱，内襟有白漆手写的“总字129部队”。凡是书自然都是“顺”的，源源不断，且有时批量出货，有一本关于阐释《资本论》的“论著”，同学几乎人手一册，但没人看，都堆在宿舍床上。

经过我手的有二十世纪上半叶王云五编的《万有文库》，还有一本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的培训教材，纸黄字糙，内容包括跟踪与反跟踪、偷拆信件（或称“邮检”），其中又分熏蒸、信封角卷出、透亮等方式，以及购置常用信封信纸以备替代。读过此书，让我神情紧张，后落下毛病，收信先端详四角，再对亮照照。

当时中学“红代会”作战部由“四三派”金坚掌控，办公室设在四中，主任是高三（四）秘增凯。他们派人去西单某地检查某“联动”分子的信件。据说为了保证邮检，所有本市信件一律四天以上才投递。“红代会”作战部还去搜查“联动”分子，我跟着去过女一中“联动”分子的家查抄。那家的妹妹叫李明冬，姐姐叫李小石，是北大学生。那是个不大的院落，有车房、锅炉房。其父是纺织部副部长。我没进正房，站在东厢房门口张望，那是她姐姐的房间，有个纸盒里除了叠得整齐的军装和皮带，还有一封信，姐姐执意不许看，说是她男朋友的信，检查者非看不可，于是发生了争执。最后说撤就撤了。

在地下流传的内部书籍分几类：文学类的黄皮书，比如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卡夫卡的《变形记》、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政治类的白皮书，比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托洛斯基回忆录》；还有科技类的蓝皮书，比如关于美国原子弹研制过程的格罗夫斯将军的《现在可以说了》以及泰勒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等。

我在文学上开窍晚。记得“红八月”，在音乐学院“对联”辩论会上，我们班季如讯居然抱着《安娜·卡列尼娜》，还边看边议论，音乐学院红卫兵大为不满，把我们赶了出来。大家几乎都是从《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开始扫盲，进而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巴尔扎克等大师挺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共有九十一部长篇，据说女附中姚宇红家有全套。有一天听她在电话中跟同学聊《驴皮记》，这书我没读过。跟她讨论尚可，要是想借书，没戏。

史康成是个爱读书有思想的人，他也看小说，但不痴迷。特别喜欢的是杰克·伦敦，既喜欢带有资本主义向上时期野性进取的力量，也喜欢坦诚的狡猾和注重手段的人生态度。杰克·伦敦说过：“当名誉和金钱一起来的时候，我选择名誉；当两者分别到来时，我选择金钱。”这句话被史康成推崇备至。他最崇拜的还是卓别林，电影看不到，他读了传记《卓别林——不朽的流浪汉》，其中把卓别林描述成“一个晃来晃去的人”，让他触动很深，他本人外号也跟着改成“老晃”，直到今天。

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斯宾塞的《进化论》，他不吃不睡，几乎到了发痴的程度。我俩痛感世道艰辛，一天议论时政：假如毛主席不在林彪接位，是抓经济还是对外出兵？记

得天渐黑下来，没开灯，我俩坐在黑暗中说。他还讲了个当时要杀头的政治笑话。我一听不禁慌了，赶紧摸黑走人。

有一次，高二（二）班陈捷牵头，把大家带到北大的郑昕家听他谈哲学。郑昕是第一个到德国攻读康德的中国学者，自一九三三年起在北京大学讲授康德，历时三十余年，国内研究康德的学者，或直接出自其门下，或间接受其教益。一九五七年“反右”，自然在其列。郑夫人与陈捷母亲是西南联大同学，闻孩子们好学，于是安排这次见面，我和史康成也混在其中。郑先生很谨慎，显然做了准备，先拿出几本《红旗》杂志，以署名唐晓文的《要读一点哲学》一文开场，让大家朗读，给讲课添点正统色彩。任志和蒋效愚发问，认识论是不是科学？如果是科学，将向什么方向发展？老实说，这类问题着实让郑先生为难。话题一转，谈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立。认识过程，从感觉、直觉、表象到概念、判断和推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到表象为止还属于感性认识阶段，此后就是理性认识阶段，大家刨根问底，非要把感性怎么就变成理性说清楚不可。尽管郑先生谨慎，涉及真理时也正色说：由于思维的非直观和复杂性，到目前为止，“科学尚未彻底揭示思维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史康成不吐不快：“既然唯物主义者解释不了这种转化，我看还不如唯心主义。”郑夫人略显惊恐，招呼大家喝茶，把话岔开。

## 六

史康成有个四中初中同学，叫于友泽（后笔名“江河”），也属待分配之列。有一天，他读辛弃疾有感，与我共享：“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他既写诗又画画。他画的月票足以乱真。月票底板和照片上盖“骑缝章”，每月更换的是底板下半部印有月份的彩图。仔细对比，还是能辨别真伪，可装在皮夹里上下车一晃，轻松地蒙混过关。

有一天，于友泽来找我，神色慌张：“赵京兴被抓起来了！”“那怎么了？”“进局子身上还拿着我画的月票呢！”我安慰他说，赵京兴犯的是谋反罪，弄不好要掉脑袋的，警察才顾不上鉴定那月票真假呢！

对我们来说，赵京兴可算得奇人了。他读古典哲学的速度跟我们读小说差不多。他住平安里，离我家不算远，有时来借报纸，有时访问振开顺便来坐坐。我很少主动打扰，怕影响他的时间。

赵京兴思想的边际和轨迹，我是在批判会上才大致知道的。我曾试读哲学，怎么也看不懂。我问赵京兴，我怎么看不懂，甚至到弄不懂这段话最终是肯定还是否定。我用手指指数着：肯定，否定，肯定，再否定。赵京兴并不笑我，但也没教给我什么“绝招”，他只说凭感觉，“一看就明白说的是什么，就像看小说”。

我参加过三次赵京兴批判会。第一次在一斋宿舍，校方没什么准备，喊喊口号、平平淡淡过去了。第二次在生物实验室，由高一（一）班高中主持，他是“校革委会”委员，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他一声喝道“把反革命分子赵京兴押上来”，赵京兴低头弯腰，眼镜掉下来。他把眼镜戴好，直起腰，嘟囔了一句，“摘了眼镜看不清东西。”惹得工宣队的师傅勃然大怒：这屋里是人，不是东西。紧跟着一串脏字。然后是一篇接一篇大批判稿，原来赵京兴还说过“批判毛泽东思想”，我都替他着急。可他振振有词：“批判并不是简单否定，这是普通的常识。”他还引经据典：马恩两卷集某页某行，批判就是否定，批判就是继承，总之批判就是革命。朋友们暗暗叫好。主持人高中质问他：狼子野心，你还敢说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你说说你到底怎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赵京兴还真的阐明他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

思想，如今我只记得有哲学、农业和货币这三方面。私下见面时我从未和他谈过理论，倒是在批判会上听到了。赵京兴被押了下去，主持人高中做最后总结：革命师生把他批得体无完肤，表面他不认输，按他自己日记里的一句话，这叫“硬着头皮，高唱凯歌”。这时押到门口的赵京兴，挣着脖子喊了一句：“那是鲁迅先生说的！”全场哗然。

第三次是斗争大会了。他戴着脚镣。由市公安局的警察从监狱押来的，在大操场举行。他的样子很憔悴，但依然镇定。会场旁还堆着轮胎。多年后赵京兴告诉我，白洋淀老乡托他从北京带的旧轮胎，成了投机倒把的罪证。赵京兴坚信马克思主义，一直到今天，他是真心的。

## 七

四中待分配队伍中又添了新人。自一九六八年二月起，六九届、七〇届新生分别就近入学，四中开始有了女生。而六九届和七〇届分配待遇不同。六九届全锅端去军垦兵团，七〇届有不少进了工厂和服务业，下乡也只限于郊区。

六九届的男生张文新，长得英俊，待人热情，遗憾的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腿有残疾，孩子们起了个很刻薄的外号“瘸美丽”，他并不介意。他借给我两本日汉字典，每本都有十多厘米厚。当时市场无货，有货我也买不起。这字典居然是原北京军区司令杨勇家的。杨勇的小儿子杨北北和张文新同班，离京托他看家。杨勇为贺龙的死党，因所谓“二月兵变”身陷囹圄多年，所谓家，不过是我家隔壁正觉胡同的小平房，堆放些东西，字典是杨北北哥哥的财物。几年后张文新找我要字典，原来杨家要回京了。听说杨勇病重无子女能出面，张文新挺身而出闯中南海，把材料交到周总理手上，才救了杨勇一命。他从不居功自傲，后来杨勇当新疆军区司令，小舅子是新疆驻京办事处主任，张文新在那儿找了个烧茶炉的差事，他告诉我轻省。他在京城高干圈里名声极好，万里外派去安徽，北京家也交他看管。我曾去北京邮局办事，把他找的推荐信递上，那局长看了诚惶诚恐：“是边涛推荐的，是边涛推荐的！”后来才知道边涛是万里夫人。他最熟的还是杨勇和胡耀邦这两家，他俩表兄弟，都是湖南文家市人。有一回，张文新坐着杨勇的“大红旗”来找我借五块钱，原来胡耀邦病了，他在看望途中发现钱不够，临时向我求助。这就是跟我一起等待分配的小兄弟。

开科技先河的首届老初三“玛瑙”，还真不知道他的真名。“玛瑙”在家搞科学实验，用空气（准确说是二氧化碳）和水变成葡萄糖，我赶紧去学习。他家在四中对过儿的一条胡同里，院子大，满地桃核，烧得黑糊糊的。“玛瑙”介绍说这是活性炭，作为催化剂，物理特性越硬效果越好。实在让我佩服，相信他一定能成功。以后我设计过化肥厂，合成塔内压力三百二十公斤，于是想起“玛瑙”。把氮和氢合成氨，再撒在地上长庄稼多麻烦，既然氮和氢能合成，那么二氧化碳和水将来也一定能合成。

大家时兴做万用表、攒半导体。连语文老师黄庆发都下场装了个收音机，放在耳边听着得意。做万用表，离不开波段开关和表头。我虽毫不入门，也跟着他们凑热闹。高二（五）班高光宇又拉提琴，又攒电视，但给他介绍女友时，这些特长好像还提不上。

我们常去高三（四）班陆天育家。文革前，他在北海少年科技馆无线电组，他弟弟在少年宫车工组，哥儿俩动手能力极强，我们玩的相机、气枪、唱机、收音机、乐器几乎都是委托店的便宜货，时不时得送到他家修理。陆家有各种小机器：洗相片的曝光箱、放大机、裁纸刀、上光机；弄来个轧面机，配上齿轮，哥儿俩轮流上阵还轧出面条来。连自行车座都是自制的，比摩托车座还舒服。陆天育在朝阳门专买旧货的小市看中块电流表，顺手牵羊时被发现了，扭送派出所，警察哭笑不得：“拿什么不好，拿这破玩意儿。走！”

陆天育住东城，街面高过院子，进院下台阶，家小，仅一间。他母亲是河北北京中学的英语老师，见我们来总是很高兴。那年头儿，人们去干校下乡，家具电器半卖半送处理掉。那天伯母碰上架小尺寸钢琴。他们那间小屋并排只能放两张单人床，而这琴长度窄，刚好塞在两床中间。她兴奋地比画着，琴凳转过来，两头接上椅子就能睡在上面，用不着俩孩子挤一张床了。可从来没见过他父亲，我们都没问过。大家嘻嘻哈哈拆卸气枪，伯母坐在一旁默默看着，脸上浮出微笑，一种隐忍的微笑。

我们常到各家委托店“淘宝”，东单的那家叫三洋，西单路南的叫中昌，护国寺的叫益民，隆福寺那家是委托店第三门市部，索性叫“当三门”。黄其煦亲眼所见，有人只花了三百块就从东单委托店，前呼后拥推走一架三角钢琴。

留在北京，相当于驻京留守人员，尤其冬天，接待任务繁忙。一到农闲，插队的同学云集北京，开春再带足挂面和酱油膏回乡下。而军垦的同学每两年才能回京探亲，每次也只有十二天假，远不如插队自在。同学相聚，嘻嘻哈哈，争先恐后说话，我不禁诧异，看来插队生活挺有意思的。一个插队的同学回答：“有意思？一年里有意思的事一个钟头都跟你说了！”

一九六九年底，以高二（二）班同学为主，在四中教室追悼张育海，我家离得近，用自行车搬去电子管收音机，接上唱机怎么都不响，十分狼狈。没有灵堂，没有鲜花，由蒋效愚和任志主持，最后大家低沉地合唱阿尔巴尼亚的《献给游击队的战友》：“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和你生活战斗在一起，唱起战歌冲锋杀敌，我们的歌声就是武器，唱起那游击队之歌，就想起你啊亲爱的战友，在暴风雨中唱一首歌曲，献给你啊亲爱的兄弟！”这是一首大家喜爱的歌，谁想到竟成了悼亡曲。

## 八

音乐是文革中学生生活的重要部分，同学们私下流传唱片，自学乐器，早就突破了八个“样板戏”的禁锢。最流行的是《外国名歌二百首》，这是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歌曲集，简谱袖珍本，被大家奉为经典。第一首是国际歌。依照《外国名歌二百首》，史康成咿咿呀呀地学唱，一板一眼，比如印度的电影插曲《拉兹之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学唱此歌的过程想必很痛苦，切分、符点、连线、装饰音俱全，有的音符下画三道横线，还有可怕的升降号。

史康成的音准，赵振开的小钢声，郎放的纯正音色，还有徐金波和刘志鹏的假高音（被戏称“鸡婆”）。我不唱歌——走调，别人走调听得出来，自己走调却浑然不知。是张育海救我于水火之中。有一天，他带黄其煦来找我，育海胳膊窝下夹着提琴盒，黄其煦规规矩矩提着黑管盒。黄其煦现身说法，指出吹笛子的害处及改吹黑管的好处。还告诉我个秘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北京管乐器厂出了不少处理品，新的黑管才二十八块。于是我改学吹黑管。哥们儿中吹黑管的还有杨百朋。

在学校混过政治学习，结伴而行，到某人家听唱片去。骑车到叶林宗家，两个弟弟叶林江和叶林辉，都上四中，其父是师大教授，文革中改住筒子楼，楼道堆满杂物，不侧身过不去。叶林宗捧出唱片，七十八转，《天鹅湖》的“拿波里舞曲”最吸引人，那小号清澈流畅，听了一遍又一遍，如醉如痴。



叶林辉很活跃，他和孙沛蹭火车去广州玩，事先配好列车员用的三角钥匙，回程时钻进火车厕所的阁楼，睡到终点没下车，在车库被发现，一顿臭揍。一起听唱片时，他脸上还带着伤。

文艺宣传队出了不少人才，高一（四）班小提琴手刘克希，先分到六建，后考上中央广播文工团。高二（二）班赵颐庚拉手风琴近乎痴迷，不知疲倦地练习指法，一个指头动时另几个指头闲着，左手和右手配合得像两个杂技演员，甚妙。有一次在东单委托商店见到牟志京，他在等着买一台意大利手风琴，在身上不停地做分指练习，好像在寻找穴位。那天，北边柜台地上立着一架电子琴，上面用红漆写着“马国光”的繁体字。马国光受迫害，前不久被抓，他的琴竟流落此处。

我手上有不少唱片，都是四处“淘”来的，更多的是赵振开家劫后余生的。除了七十八转老唱片，还有四十五转、三十三转密纹的。七十八转多是古典，密纹的往往比较新。史康成父母有文化，他家的唱片有陈刚、何占豪的提琴曲《烈士日记》和《红旗颂》。振开从中央乐团的姑父那儿，借来一张帕格尼尼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是“德意志唱片公司”的三十三转密纹唱片，我们如获至宝。另一个圈子干部子女也有这么一张，后来丢了，认定是史康成偷走（有人听说他家有），于是打上门来，被警察拘留，写了检查才放人。

像我这种不下乡且交往杂的人，早就被四中和街道盯上了，尤其我夜里开红灯冲洗胶卷照片，被当成从事特务活动。一天下午，先是街道积极分子敲门查卫生，紧接着警察就冲进来，把抽屉柜子翻了个遍。抽屉里有个大牛皮纸公文信封，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字样，警察眼睛都亮了，可惜不是军事机密，而是一张人腿骨的X光片。警察宣布没收全部唱片。我拿出《烈士日记》求情，警察怒喝道：少废话！他们命令我用自行车驮着一口袋唱片，把我押送到厂桥派出所。审讯者有“片儿警”也有西城分局的。问不出所以然，最后要我写检查。至今都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学校事先知情。第二天我回校汇报，分配组黄立环老师脱口而出：“他们已经去了？真快。”

## 九

留在北京的压力越来越大，学校、街道、父母单位，甚至与公安部门相结合共同管理我们，批斗会、下厂劳动、政治学习都是必须参加的，再加上一波波的下乡动员。我告病躲到清华大学亲戚家，陪伴孤老太太，实在寂寞。有一天被召进城，原来是我母亲的机关让她动员我上山下乡，办不成就别上班。没辙，我和母亲拉着手，来到学校报名去内蒙古兵团，她一路安慰我，只要妈还有工资，一定会支援你。内蒙古兵团负责招工的头头儿，拖长声调打官腔：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没走，愿不愿去啊？“不愿意”，我坦言道。他一下愣住了：你不愿意，我们还不愿收你呢！

四中安排我参加了三次下厂劳动。头一次是第三轧钢厂，分在仓库。第一天上班怕迟到，进了厂门猛跑，被工人师傅拽回来。原来厂门口立着毛主席画像，必须先鞠躬，敬祝万寿无疆。仓库也按军事编制，开工前对着仓库里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三轧钢某连某排向您请示，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每人每天的工作安排，在说给毛主席的同时，我们也就听见了。晚上下班时“晚汇报”，表扬谁批评谁都是冲着毛主席说的。

一旦中央电台播出毛主席最新指示，工人们当晚就得赶到工厂，连夜敲锣打鼓上街庆祝，我们没跟着去。第二天“早请示”，每个人背诵最新指示，轮到我们四中同学，张口结舌。

第二次是到朝阳区汽缸垫厂干活。工序很简单，两层铜箔夹着石棉，下片套上片，用木槌砸扁就成。这是个典型的街道工厂，一个小院三间平房，远比不上“三轧钢”，人家号称产业工人，毛主席还送了芒果，泡在装有福尔马林的瓶子里。而这里静悄悄的，只有女工们聊天，家长里短。

最后一次是发配到北京灯泡厂，佟玉馥老师负责，带队是高（六）班吴泽林，一起参加劳动的还有六九届“泡”下来不走的孩子们。北京灯泡厂在关东店，满街的京字牌灯泡就出自这里。有个吹高压汞灯泡车间，大火喷燃，师傅手持一人多高的金属管，蘸上玻璃熔料，对着火边吹边转，像吹泡泡糖，再放在模子里边转边吹，最后成型。师傅们不停行走，交错站位，数根金属管一边旋转一边随着身体摆动，犹如舞蹈一般，煞是好看。白炽灯车间最壮观，每条生产线都有几十米长，灯头密密排列，很像纺织厂。排列的灯头在火焰中旋转，远远看去是一排排火球，再加煤气、压缩空气和氧气发出啸声，令人震惊。

我和几个六九届的孩子被分到设备维修车间，我当上了管工，很得意。第一课就是锯管子，从六分、一英寸开始，张师傅示范，上锯条，拧紧，两下就把钢管锯开。我刚上手锯条就断了，张师傅说：“再来！”在他充满信任的目光下，我拉开弓箭步，把身体重量转移在锯上，双手前后移动划出弧线，终于成功了。接着学套扣，就是在管口套上螺纹。再往下是缠麻刀、抹油灰、接管子。我学得用心，张师傅对我很满意，连接煤气管这样的活也放手让我干。有时，我爬到大车间房顶维修，四下张望，黄色是氮气，蓝色是氧气，红色是煤气，还有压缩空气和惰性气体，各种颜色的巨龙般粗管子到处延伸，加上火球飞舞的绵延不绝的灯泡生产线，蔚为壮观。手上是沉甸甸的管钳，不由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很久很久没这么痛快舒畅了。

好景不长，我惹了麻烦。有一天学《毛选》，有几个六九届的孩子打瞌睡，我替他们辩护了两句，说管工在户外干活儿冷，进屋暖和犯困是正常生理现象，结果被汇报到学校，上纲上线说我扬言学《毛选》犯困是正常生理现象；还有一次闯祸与波兰有关。瓦文萨闹罢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意是苏联坦克压不垮波兰人民，我就顺着为波兰人民说了两句，又犯大忌。批判会在维修车间举行，带队的同学立场坚定，佟玉馥老师也来参加，工人师傅们坐在另一边观看。学生逐一发言，我曾为之打抱不平的男孩是贫民子弟，为人仗义，死活就是不发言。我越是解释，就有越多的质问，而沉默又是对抗。只见张师傅突然起身，走向锻床，用大钳子夹住烧红的生铁，用气锤狂打，伴着一声声巨响，火星四溅。他大声吼道：“干活了，干活了……”

十

张幼声的母亲在新华社工作，总能带点内部材料与大家分享。那阵子党中央开“九大”，严格保密，张幼声居然搞到会议抄件。比如中央委员会选举，江青缺了几票，引起我们的极度兴奋。更甭提选政治局，由周总理主持，统一计票时，总理问：这张选票是谁的？是空白票！后面一人慌忙举手站起来，“是我的，我弄错了”。于是补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自然是全票。这材料传到工宣队手上，追查到我这里。我信口开河，那时碰上追查“反革命谣言”，就说要么公共汽车上听的，要么厕所蹲坑听的，信口胡编。工宣队追查了一阵不得要领，就捂住不敢再追了，这事太邪乎，弄不好自身难保。

四中经常组织“老泡”们学习，没固定地点，有时在教研室，有时端小凳坐在院子里。交流病情，议论时事。老初二的刘学煌见多识广，他知道 NBA，说那球打得像杂技，过半场

一扔球准进。高二（五）班王伟擅长丹青，在生物实验室随便画两笔，就是虾米，一抹一挑，青蛙跃然纸上。

李宝臣是个人物，祖上是清朝提督，人家不说满族，在那时代坦然说“在旗”。宝臣潜心清史，为了研究清朝宫廷礼仪，热衷于参加“首都革命人民砸烂旧颐和园联络站”的活动。他常坐十二路郊区车去颐和园。蹭车的都知道，到终点站查票最难办，不像中途，临开车门皮夹一晃跳下，心理压力最小。有一次，售票员一路喊着“查票”过来，宝臣纹丝不动，“你的票呢？”“月票”，他坦然答道。“拿出来。”宝臣掏出皮夹给她看，“打开！”售票员失去耐心。宝臣沉着地打开皮夹，里面是个购货本，其实根本没有月票，可还没等抬头，售票员已经走远了。那年头儿，慈禧太后的宫廷女官容龄公主还在世，门前冷落车马稀，家人都唯恐躲之不及，宝臣却上门嘘寒问暖。老人作古后，宝臣的脑袋也就成了孤本。

一日，听说李宝臣和分配组长罗炳康顶嘴，互相揪着脖领子找工宣队评理去了。我赶紧跑到教研组小院东边的工宣队办公室门口观望。少顷，宝臣出来，气定神闲地说：“我不吃亏，国家给他发工资，让他管学生，管不了还找工宣队，无能，干吗吃的？！”他补充道：“我没揪他脖领子，我从不干这等事儿……不怕，到时候他还得给我分工作，气死他！”

这事真还让宝臣说中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北京四中紧急召集我们开会，在大阶梯教室。果然出了大事：美国派基辛格秘密来华，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做准备。首先要铲除所有社会不安定因素，其中一条就是安置我等闲杂人员。

我们的命运和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连在一起。真快，一个月后，韦振邦、徐宝平、沈龙飞、王焱和我被分到西城碳素厂（又称“展览路电碳厂”），史康成、张幼声去了拔丝厂。最后只剩下住宿舍的老初三的王文光。他有小儿麻痹症，走路艰难，坚持练小提琴，自强不息。我们走了，他的分配还没着落。行前去告别，我说，“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以后我可就不是四中人了，可别不认识我这烧火工啊。他强忍眼泪，还跟我开了个玩笑。

离开宿舍，身后传来王文光的提琴声，那是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主题曲，乐曲起伏激越，应和着我们的迷惘与惆怅。头上阴霾聚散，忽明忽暗，回望那进出六年的校门，显得分外肃穆，古色苍然。

别了，我们的学生时代；别了，北京四中。

□ 来源：《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曹一凡、维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

~~~~~

【史海钩沉】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 陈徒手 •

一九六〇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作了如下鉴定意见：“（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北京的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没有回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

现年八十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

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士都关心过汪曾祺调动之事。

一九六三年他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讲述道：

为了赶一九六四年现代戏汇演，团里迅速充实创作力量。改《芦荡火种》第一稿时，汪曾祺、杨毓珉和我住在颐和园里，记得当时已结冰，游人很少，我们伙食吃得不错。许多环境描写、生活描写从沪剧来的，改动不小，但相当粗糙。

江青看了以后，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等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在报上做了广告，但最后还得听江青的。这出戏在艺术上无可非议，就是因为赶任务，以精品来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又到了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改剧本，薛恩厚工资高，老请我们吃涮羊肉。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大家出主意，分头写，最后由汪曾祺统稿。沪剧本有两个茶馆戏，我们添了一场，变成三个茶馆戏，后来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当时他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

赵燕侠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份。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访）

据汪曾祺一九七八年写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江青曾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坐下来就问：“汪曾祺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

“没有。”江青“嗯”了一声说：“哦，没有。”江青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她曾与萧甲说过：“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直到一九六八年冬天，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传达江青指示时，还有这么一条：“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

杨毓珉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

汪曾祺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历史问题，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萧甲也表示：“江青说过‘控制使用’这句话，在领导范围内说过，积极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来。”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濂回忆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采访）

杨毓珉认为：“汪当时确实不能再犯错误，因为谁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也谈及这个问题：

“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采访）

有一回，汪曾祺伤感地对剧团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曾形容，江青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辗转反侧。一九六五年五月，江青在上海反而这样说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

江青对汪曾祺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对《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满意。在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同志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两句，我当场就想了两句，她当时表示很赞赏。（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历经几年文革风雨，一九七二年四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可见江青对汪曾祺手中那支笔的看重，正因为如此，汪曾祺在文革中很快就从“牛棚”解放出来，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早晨，军代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会议室去谈话，对我说，“准备解放你，但是你那个《小翠》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说，“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很不驯服的人……你去准备一下，做一个检查。”

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我，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去表一个态。”

等群众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同志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表态之后，就发给我一张票，让我当晚看《山城旭日》，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些时候，李英儒找我，说让我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说，“陪江青××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

汪曾祺形容自己当时如在梦中，心情很激动。江青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解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祺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后来，汪曾祺真实地谈到自己内心的想法：“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摘自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按当时惯例，《红旗》杂志要发表各个样板戏的定稿本。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五日，江青找汪曾祺他们讨论《沙家浜》，以便定稿发表。江青说哪句要改，汪即根据她的意见及时修改，直到江青认可为止。全剧通读修改完毕，江青深感满意，汪曾祺也认为自己“应对得比较敏捷”。没想到，五月十九日晚十时半，江青的秘书忽然打电话到京剧团，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门，原订团里参加“五二〇”群众大会的只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三位主要演员。那天，汪正在为《红旗》赶写《沙家浜》的文章，他跟军代表田广文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们先在一个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西侧。这天，江青没有出席大会。《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在几百人出席的名单中出现了汪曾祺的名字。老作家林斤澜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看到报纸一阵惊喜。十几年后他笑着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了。”

汪曾祺那时有了受宠若惊的知遇之感。他的儿子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汪朗表示，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而且父亲觉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剧，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江青对样板戏剧团“关怀”备至，对办公、剧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诸多方面一一过问。有一次，马长礼告诉江青，现在剧团在后台办公不方便，房间窄小。江青问：“你说哪有好的？”马长礼说，工人俱乐部旁边有一座小楼。事后江青一句话，把那座小楼拨给北京京剧团。江青嫌原来饰演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的演员岁数过大，称他们为“胡子兵”，就调换来戏校年轻学生，表示这群伤病员的戏要整齐。在讨论芦苇荡一场戏时，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词：“敌人的汽艇过来了。”以此来烘托气氛。这一切给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认为江青在当时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而且提供了当时算是优越的工作条件。

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时，江青在扉页上写了“赠汪曾祺同志，江青”几个字，江青写字很有力。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碎了。据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只印了两千册，是毛泽东、江青自留或赠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当时备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动。

身为剧团负责人、《沙家浜》的导演，事隔三十多年，萧甲认为对过去日子应持客观态度：

谁都得按当时的气氛生活，江青是那个地位，我们都得尊重她。江青一边看戏，我一边记录，不能说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后单独谈，那就表明她经过了思考。有时她说话就比较随意，她说，“柳树呆板，太大了。”我们改了，她又说，“我跟你们说了，怎么弄成这样？”如果弄得不太好，她还会觉得你跟她捣乱。

有一次，演员们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见，我说，“别争了，这是江青的生死簿。”

还有一次，江青说：“看《红灯记》就落泪。”我在背后说：“这不好，这会损寿。”有人汇报上去，江青说：“咒我早死。”市委很紧张，就让我在党内检讨。我说，没恶意，只是诙谐。

上天安门，是江青说了算。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她每次看到汪都很客气。汪曾祺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在地写东西。他在团里挺有人缘，主要演员都看得起他，他在剧作上很有贡献。（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访）

汪曾祺是个严谨认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第一届全国样板戏交流会上，他奉命二次到大会上做过有关《沙家浜》的报告。有一次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他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汪曾祺后来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过他。

汪曾祺以后反省时，也感到自己那时也陷入狂热和迷信的地步：我对江青操心京剧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说她身体不好，出来散步，带一个马扎，走几步，休息一下。她说一直在考虑北京京剧团的剧目，说她身边没有人，只好跟护士说，“北京京剧团今年没有一个戏，全团同志会很难过的。”我为她的装腔作态所迷惑，心里很感动。（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他曾先后为《沙家浜》写过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刊登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动笔前领导指示要突出宣传江青在样板戏中的功绩，一切功劳归功于江青。一位领导还叮嘱道：“千万不要记错了账。”

汪曾祺在文中注意用小细节去披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们最近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开打中，让郭建光和黑田开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脚下”、“江青同志曾经指出，应当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关键的地方，小节骨眼上，不放过”，等等。

汪曾祺对于当时的一个场景一直难以忘怀：在康平桥张春桥那个办事处，江青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我和阎肃面面相觑，薛恩厚满头大汗，李琪一言不发。回到招待所，薛还是满面通红，汗出不止，李琪说，“你就爱出汗”。（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汪曾祺《关于红岩》）

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体验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一星期。阎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我是被反铐的，马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得很逼真。”杨毓珉说：“我们戴上镣铐，每天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枪毙，真放枪，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而我们已回招待所睡觉。后来上华山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人的衣服前进，第二天天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

接着，江青又授意改编《草原烽火》，汪曾祺、杨毓珉、阎肃他们又在草原上奔波两个月，一辆吉普车的玻璃全震碎了。回来汇报说，日本人没进过草原，只是大青山游击队进草原躲避扫荡，发动牧民斗争王爷不符实际。于会泳却说：“那就更好了，海阔天空，你们去想啊！”

“很早就听曾祺讲述这个故事，几次听他在会上讲。既把它当做笑话，也看作是悲剧。”是汪多年好友的林斤澜谈及此事，不由长叹一声。

杨毓珉介绍说，《杜鹃山》第二、六、八场是汪曾祺执笔写的，全剧写完后又出了一段故事：江青一开始就说，可以撇开话剧，可以杜撰。江青看《杜鹃山》韵白很好，高兴之下又要我们把《沙家浜》的台词也改成韵白。我们费劲费大了，真写出来了，江青来电话说，算了，别动了。（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在写《杜鹃山》雷刚犯了错误还被信任的台词时，汪曾祺联想到自己的际遇，一时动了感情。他对别人说：“你们没有犯过错误，很难体会这样的感情。”

七十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回忆说：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是突出的，他在《杜鹃山》的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采访）一九七三年后，江青与张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联系，于会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队伍，汪曾祺与他们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一九七四年七月，于会泳通知汪参与《新三字经》修改，此书将作为小靳庄贫下中农编的批林批孔读物，汪只写了其中几句话：“孔复礼，林复辟，两千年，一出戏。”一九七六年二月，于会泳又要把电影《决裂》改成京剧，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资派的级别写得高一点，并表示如果样板戏不注意质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后来于对《决裂》彩排不满意，批评说像是一根绳上挂了许多茶碗。汪曾祺他们想不出办法，只好每人读有关“三自一包”的材料。十月十一日开会，原订汇报各自的设想，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暗地里已经知道“四人帮”垮台了。

我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都可能搞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冲动。

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

我觉得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青在《沙家浜》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帮”，还没有反党篡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慎重。（摘自一九七八年九月汪曾祺《综合检查》）

一九七七年四月，团内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五月，汪曾祺在创作组做过一次检查。八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检查。当时文化部长黄镇认为，文艺界清查不彻底，高压锅做夹生饭，火候不够，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当众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

当时上面认为江青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老头成了怀疑对象。老头天真，别人觉得他日子过得风光，他觉得受苦受累大了，别人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自我认识有很大反差。把他挂起来，他接受不了，跳得挺厉害，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指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处跟文革不合拍，不认同。在创作上痛苦不堪，他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四人帮的。在大环境中若即若离，没有成为被政治塑造的变形人。

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儿子汪朗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口述）

那时他写了不少反驳材料，不同意人家写的结论。人家让他签字，他逐条辩驳。他被单独审查一阵，让回家，但不让串连。从上面来了一批老干部，整得厉害。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帮倒之前，却没少传小道消息，把我们吓死了。《红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诉我的，说，“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兴，手舞足蹈。



后来有一阵审查松懈，无人管理。刚好曹禺《王昭君》发表，闲来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昆剧，我改成京剧。那时他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

我们劝他搞小说，他说，“我没有生活，写不出来。”实际那时已在打小说腹稿，还找出四七年写的小说给我们看，让我们说归什么类。

他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题先行，极左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王蒙、邓友梅说不能听样板戏，老夫子很同情，觉得是这么回事，对他们能理解。（老同事梁清濂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口述）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袁韵宜记得那时见到汪曾祺进出办公室，总是低头进低头出，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杜鹃山》导演张滨江说：“他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审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待材料，成为他十年样板戏创作的副产品。

后来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乔木当场找了一张烟卷纸，上面写了“汪曾祺到作协”几个字。汪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复杂。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受戒》、《大淖记事》已经开始谋篇成形。张滨江曾听他讲过《受戒》中的故事，梁清濂读了《受戒》初稿后，惊讶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上介绍《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注意，就沿着线索索取《受戒》发表。

林斤澜说到另一名作《异秉》的发表经过：汪曾祺当时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我说，把《异秉》交给我转寄吧。《雨花》的叶至诚、高晓声看后觉得很好，说江苏还有这么好的作家。但是两三个月没发出来，我写信问，叶至诚说，“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组通不过。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高、叶一定要发，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很欣赏编者按，认为他懂。（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采访）

以后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声名远扬。阎肃看了他的新作，打电话夸奖，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阎肃有感而发：“汪曾祺这个人没有城府，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他忆起文革中在上海写剧本时，与汪曾祺在街头小店喝黄酒长聊的情景：“我们不敢议论江青，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的事、读过的好书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

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杨毓珉他们所说的书生气、士大夫气，成败俱在于此。

一九五八年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结尾如此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使他切切实实地付出痛苦的代价。后来他对人说，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劳动时心里很惨，唯一乐事就是给六岁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我不会拼音，逼着我学着用拼音给儿子回信。

儿子长大了。目睹父亲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劝慰情绪起伏很大的父亲。儿子说，你没有什么是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没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认识，就是有点知遇之恩。儿子说了很多，父亲想了想，总是说：“对！对！”汪曾祺后来爱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一切又归于平淡，平淡如澈。

◇ 附：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题记

八十年代在中国作协工作时，曾有幸与汪曾祺先生有过几次交往，去过蒲黄榆家中做客。他好客，但有时却安静得可怕，个性鲜明。汪先生去世后，我多半是从汪先生的好友、老作家林斤澜先生那里获知他的有趣故事。

汪曾祺先生的儿女都非常出色，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像汪朗、王朝都是有求必应，这么多年帮了我很多忙。他们所写的父亲著作，我一直认为是作家家属中写作最棒的书籍，从不讳言如深，情趣荡漾，乐不可支。

当时我最想读到的是汪曾祺的档案，因为知道1976、1977年汪先生曾被迫写了十多万字的交待，以此来换取政治上的解脱。原本查阅档案之事想像很复杂，难度很大，但没想到去北京京剧团联系时，一递上介绍信，就受到老干部处同志热情接待。经过领导研究，他们同意我查阅部分档案。记得我第二次去剧团时，那一天刚好有京剧团老人去世，老干部处的同志大都去八宝山经办丧事，只留下一两位小姑娘看家。小姑娘打开柜子，抱出两捆东西，用一根塑料绳捆了十字结，上面有毛笔写了“汪曾祺”三个大字。

打开一看，大都是汪先生写的交待材料，约有十几万字，几乎每一个专题都有专文解释、辩解，有时一个题目会写好几次。汪先生用圆珠笔写，下面有复写纸，一式三份，笔触很有力量。还有一些是外调、揭发材料，大都涉及汪先生在样板戏的一些经历。我大约用了两三天时间在办公室查阅，对一些关键的资料做了笔录。这些手写的材料极为重要，如果书稿中缺失这部分材料，《汪曾祺的文革十年》就难以成篇。谢谢北京京剧团老干部处诸位同志，你们的好心好意成全一个写作的梦想，成全一种史料的流传。

在此次采访中，我曾经想努力接近京剧团文革中两派人士，尽力想取得考证的平衡，但又很难成功，不少人不愿再去沾文革中琐碎、说不清是非的事情，有的人谈了最后又不让在文中引用。最难以忘怀的是老团长萧甲、老编剧梁清廉、老导演张滨江等老人，他们先后几次接受我拉锯般的采访，不厌其烦，细微至极。他们均是汪先生创作时的重要领导者、合作者、观察者，他们的口述绵长而又生动，是最出色的佐证材料。

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我引用了一些当时身居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扮演者）、钱浩梁老师（京剧《红灯记》李玉和的扮演者）的口述材料，从高层的角度来印证汪先生当时的创作状态。这十几年间与刘老师、钱老师私下来往较多，他们对我的个人影响很大，教会我如何看待复杂历史的奥秘，平淡对待生活中的中意和失意。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较早写到江青在艺术方面较为内行的提法，写到江青指点彩排、关心剧团事务的诸多杂事，通过萧甲的讲述，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江青的一些为人特点：“她对作者到了哪一层不在意，是什么分子也不看重，谁有才气就敢用谁，见了有才的人很客气。”当时写这些内容时还是有些怯场，畏手畏脚，生怕惹上麻烦。相隔十几年，我们看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似乎变得更加从容和客观，没有恶意的漫画，没有恣意的丑化。

汪曾祺去世后，老作家林斤澜一再感慨：“一生最好的谈话伙伴没有了，世上无人可谈了。”林老心境的落寞和荒芜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等同身受的，他们在过去险恶政治环境中生存艰难的境遇又何尝是我们所能体察周全的？

□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

~~~~~

## 【理论研究】

### 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二）

• 吴 思 •

（上接 z k 2 0 0 3 c）

#### 5，塑造新人

（1）文革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斗私批修的目的是塑造新人。文化和教育革命都是为塑造新人服务的。

（2）新人有两个层次。一是极权层次，二是超极权层次。

##### ◇ 极权层次

文革中最为著名的英雄模范，以雷锋、王杰、欧阳海为代表，包括工农业战线的王铁人、陈永贵，知青模范邢燕子、侯隽等等，共同特征是大公无私、集体至上、舍己为人。他们的成长道路，被描述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

这种新人，毛主席的好战士，当然不是维护权利遵守义务的现代公民，与马克思设想的充分自由发展、克服异化、回归本质的个人，也相距甚远：一个自我牺牲，一个自我实现。

这种新人，也不同于推己及人、温良恭俭让的儒家君子。他们的斗争性更强，自我更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人，如果推己及人，意味着逼人自我牺牲。

上述模范的人格，其实也是极权制度推崇的人格。这些模范都是文革前培养树立的。

##### ◇ 超极权层次。

超极权新人更加重视斗私批修。因此，超极权人格，在大公无私之外，还应该有更强烈的造反精神，“反潮流”精神，娴熟地使用“四大”权利，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和错误观念斗，也与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这类人物形象，在虚构的文艺作品中多有塑造，未见成功。真实的文革代表人物，如江青、王洪文、张春桥、蒯大富、张铁生和黄帅，作为时代标志的正面形象，也先后在政治上倒台。

真正成功树立的超极权的英雄形象，大概只有一个，就是敢想好斗、无法无天、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据说，毛泽东还具备热爱人民、艰苦朴素、为革命不惜牺牲亲人等极权模范的人格特征。毛泽东有大量的崇拜者和模仿者。

但是，超极权制度只能容纳一个人无法无天，只能容许一个人与天公比高。其他模仿者，例如许多造反派首领和独立思想者，很可能入狱甚至被枪毙。观念与现实激烈冲突，超极权的英雄形象难以像极权英雄那样被社会各界接受。

（3）超极权塑造新人的努力，与极权制度的不同之处，就是超出了精英范围，也超出了观念领域。

极权主要对精英先锋队提出要求，让他们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超极权对全民提出了斗私批修的要求。这体现了超极权三角对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视。

为了塑造新人，超极权动用的手段超出了思想文化领域。经济政策也被用于全民思想改造。物质刺激原则、资产阶级法权，在经济领域遭到批判和限制的原因之一，就是刺激人们的私心，不利于培养革命新人。公有制被看作新人新思想生成的基础，提高公有制水平，可以提高新人新思想的层级。（7）

#### （4）塑造新人的理论难题

在真实的世界里，在极权道路与威权道路的冲突中，例如在“三自一包”与人民公社和共产风的冲突中，民意、常识、公道、效率和人之常情，往往站在威权一边。因此，诚实的新人，内心应该体验到许多困惑不解。

进一步说，人性能否被改造到大公无私的程度？（8）人们是否愿意改造？人性改造成功是否意味着可以移山倒海并建成理想社会？

再进一步说，持悲观的现实主义看法的人是否应该被打倒？最后，假设超极权式的人性改造成功了，新人充满世界，那么，这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们到底是谁？在基本的生理需要之外，他们到底要什么？揣摩确认服务对象谦退压抑的个人偏好，将造成多大的浪费？如果你的服务对象唯一的偏好就是为你服务，那你又该如何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为你服务的需求吗？服务对象全面丧失，服务者自身如何存在？

这种新人理想，与马克思设想的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理想如此不同，实践如此困难，逻辑后果如此混乱，却成了超极权理论的核心。

（5）人是自利的动物，也有利他之心，这是物种进化的结果。试图将人类改造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新人，像蜜蜂或蚂蚁对待自己的家族那样富于奉献精神，不惜自我牺牲，在进化论的意义上，近乎创造新物种，（9）也就是革人性的命，甚至是革人类的命。

用阿伦特的话说，这个理想是反人类的。

（6）十七八世纪，欧洲的理性主义和启蒙人文主义兴起，上帝等高于人性和人类的神圣价值遭到质疑和颠覆，统治者也不再被看作上帝的代理人，政府被视为人民增进共同福祉的一种工具。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声传遍世界。

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反启蒙运动思潮兴起，强调国家、民族、文化或阶级的特殊性和伟大使命，鼓吹暴力斗争，否认普遍的人性和人人平等。（10）

在这一轮反启蒙思潮中，军国主义的民族土地和英雄战争，国家社会主义的优等种族和生存空间，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这些新的世俗价值，作为上帝和天命的替代物，在某些时间和地点压倒了启蒙价值和人道主义。阿伦特所谓反人类的理想，乌托邦主义的理想，就是这一系列反启蒙意识形态的最高峰。

#### （六）超极权军队

1，苏联红军有军衔制。文革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对革命和平等的重视高于对分工和效率的重视。

2，解放军把创造新人当作最重要的任务。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在武器与人的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在各项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与思想工作的关系中，思想工作第一；在书本思想与活思想的关系中，活的思想第一。

3，支左，军管，军队接管全社会。

4，解放军实行五七指示，办成一所大学校。不讲分工，从事工农业生产。军队体制泛化为社会体制，社会各行业内化到军队之中。

#### （七）超极权社会

1，社会改造蓝图：“五七指示”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摘要公布了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这是一幅全面的超极权社会改造蓝图。

“五七指示”如下：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的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2，极权制度已经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农民被改造为公社社员，工人被改造为国家或集体的职工。权力吞噬了各种社会集团和社会组织。政治领域吞噬了社会领域。

超极权，作为极权制度的更高阶段，在消灭了社会上的阶级之后，还想在制度上消灭作为一个特权阶级的党政官僚集团，消灭独立于最高领袖的各种权力和政治意志。

3，在极权的一元化社会里，毛泽东放松了对群众组织的管制。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这些群众组织扫荡了旧的官僚体系之后，陷入权力争斗，偏离了毛泽东规定的斗批改的大方向。于是，群众组织被整顿、取缔甚至镇压，体制之外的群众组织基本消失。

4，取代各种群众组织，替代文革前的官僚集团，出面管理社会的，首先是军宣队，其次是工宣队和贫宣队。工人农民管理上层建筑，有些人还坚持不脱产。

5，作为精简机构、重组上层建筑的配套措施，为安排冗员和下放干部，建立了“五七干校”。

6，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八）超极权外交

1，极权外交划分了两个阵营，以反帝为主。超极权外交划分三个世界，既反帝也反修，打倒帝修反。

2，按照三个世界理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要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反对第一世界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重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3，三个世界理论，可以看作毛泽东版的天下秩序，对抗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对抗冷战秩序。毛泽东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代表了最高级的秩序。

### 三、超极权的极权基础

超极权是在极权的理论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发展成形的。

#### （一）理论基础

支持中国走向极权的理论，即斯大林版本的马列主义，认为共产党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按照这种规律，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熟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规律的伟大导师，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必须发挥舵手和统帅的作用。

1949年之后，凭借政权的垄断性力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向全社会普及，知识分子自愿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全社会高度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兼具科学性和宗教性，毛泽东被看作神圣的真理的化身。

## （二）社会结构基础

在历史发展的征途中，党的系统，建立了领袖—先锋队—群众的梯次结构，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又在实践中引起质疑，大跃进和大饥荒引发了强烈的质疑。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自发力量被逐步消灭，中国逐步走向大兵营式的社会，大一统的命令秩序逐步建立健全，领袖—官僚干部—民众的三层政治结构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结构。但官僚干部的品德才干和政治倾向也在实践中引起广泛质疑，大跃进和大饥荒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也引发了领袖对官僚在服从性和路线选择方面的不满。

## （三）民意基础

民众的不满有多种。

一种来自对极权体制造成的问题的不满。例如大跃进大饥荒和干部的专横跋扈，再如工作组整人之类的政治迫害。

另一种不满，来自现实与意识形态理想的差距。青年学生更容易追求理想，毛泽东特别鼓励他们冲击现实。如果他们响应号召批评领导，遭到打击报复，这种不满便转化为第一种不满。

走上社会的人，往往对极权制度中的领导特权不满。毛泽东支持民众冲击一些特权待遇，这也是他所反感的极权制度的一部分。

还有一种与经济权利有关的不满。例如临时工合同工，对自己的低下处境不满，试图争取和正式工相同的权利。下乡知青则争取回城的权利。

（四）在理论、社会结构和民意基础上，提升民角，压低官角，本身就有解决前进路上新问题的意义，也有部分顺应民心、伸张民意的作用。走向超极权，领袖将升至新高度。

总之，对毛泽东来说，超极权尝试，基础深厚，收益可观。

## 四、超极权建构的不同版本

### （一）版本标号与权分配

#### 1，分级标准

根据超极权三角的形态，即领袖顶角、左侧民角、右侧官角的权分配及其调整，超极权可分为不同版本。

所谓权分，即权利的份额。主要指官民双方的各种权利，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也包括让渡或抢夺而来的以暴力为核心的政治权力或政治特权。由于造反夺权和群众专政的流行，权利的概念无法描述民众一度拥有的种种政治特权及合法动用暴力的权力，于是引入权分的概念。

假如以政治经济社会的纯粹契约关系为原点，我把完全自由的状态设定为零号版本，即自由 0 · 0 版。这是一种剔除了暴力强制的理想的多元化状态。在这种秩序中，人们遵循共同制订的规则，各种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护，在此基础上自由竞争，发展创新。

随着强制的增加，自由和契约性质的一般规则逐步退缩，命令秩序逐步扩展为主导秩序，版本随之升级。

## 2，三大版本

（1）威权秩序为 1 · 0 版：政治基本强制、经济基本自由。这是有限多元化的状态。

（2）极权秩序为 2 · 0 版：政治经济一概纳入组织体系，组织体系依照个人命令和命令性规则运行，以枪杆子和笔杆子辅助。权分安排呈三层结构：领袖、官员、民众。阶级敌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沦为贱民。这是一元化状态。

（3）超极权 3 · 0 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想象的一种理想状态。在这个版本中，领袖意志深入人心，转化为民众意志，新人遍地，因此，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与极权制度的领袖命令合为一体，既超越了民主，又超越了极权，故曰超极权社会。这是超级一元化状态。

## 3，过渡版本与权分调整

在极权 2 · 0 版和超极权 3 · 0 版之间，民众的权分安排出现过多次调整。

常规的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在民主法治国家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文革前，这些权利名存实亡。在文革中，这些权利时多时少，或存或亡。特许存在的条件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的意图。

与常规公民权利不同，民众的革命造反特权属于政治权力的范畴，包含了合法暴力的使用权。革命特权的核心是毛泽东的意志。与毛泽东本人意志的距离越近，特权越大；反之则小，直至被剥夺一切权利，成为应该消灭的阶级敌人。官员和各种权力机构的赋权大小，同样遵循上述规律。

超极权版本的标号变化，主要由官民和领袖三方权分的增减变迁决定。民角和官角与顶角的距离据此变化，超极权三角的形态随之变化。

文革初期，破坏旧的极权秩序、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民众的革命特权较多。在“十六条”的承诺中，超极权可以达到 2 · 8 版。在上海夺权后的尝试中，一度达到 2 · 6 版。在打碎旧秩序之后，摸索建构超极权秩序之时，对民角和官角的赋权发生了多次调整，总体趋向是民众权分波动缩小，官方权分波动扩大，超极权逐步降至 2 · 2 版。

当然，本文设定的版本标号，只是比喻性的，并不精确，示意而已。

### （二）超极权 2 · 8 版：摧毁旧秩序 尝试巴黎公社原则

#### 1，主要时段和标志性事件



本版的大致时段在1966年6月初—1967年2月初，从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到上海公社成立。

（1）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示转发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之为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大。

（2）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宣布：

群众在文革中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等组织，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所谓巴黎公社原则，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列出了许多条，核心一条就是普选：民众有权选举、监督并罢免当选者。马克思说，用等级授权制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除了这条核心原则之外，马克思还谈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公职人员拿中等技术工人的工资、议行合一、民众自治、废除常备军等。

“十六条”把革委会规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但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常设的“群众”组织，比巴黎公社原则多了三重限制：一是党的领导的限制，二是文革期间的时间限制，三是层级限制，未涉及党政军最高权力层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在超极权3·0版中，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与极权制度的领袖命令合为一体，无须设置时间限制和层级限制，党组织似乎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如果把这三重限制算作打八折，那么，理想中的超极权3·0版，在“十六条”的承诺中只达到2·8版。

（3）1967年1月初，上海造反派联合起来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号召全面夺权。

（4）1967年2月5日，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临时权力机构诞生。

大会宣布：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公社委员和所有工作人员将通过普选正式产生，不称职者可以随时撤换。公职人员只拿熟练工人工资，一律到公共食堂排队吃饭，无个人专车。

1967年1月15日，上海夺权之后，造反派组织向毛泽东发去电报，提议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群众自下而上的提名”。

巴黎公社原则和“十六条”的要求，在提名权问题上实现了三分之二。除了张春桥姚文元所代表的革命干部之外，按照三结合的要求，新班子还有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在本组织内不难获得提名。三结合中的当地驻军代表则是上级任命的。上海群众组织的提名，并不是交给民众选举，而是上报中共中央主席批准。巴黎公社没有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党或

领袖。在这个意义上，上海试图实施的巴黎公社原则，只在提名权方面达到了省市一级，提名范围还不包括即将在各地执掌大权的军方代表。

如果把这种折扣算作 7 折，那么，“十六条”承诺的超极权 2 • 8 版，在样板上海的实践中，最多走到了 2 • 6 版。

（未完待续）

□ 来源：启之主编：《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四）》，美国华忆出版社，2019年11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